

社会变迁与文化选择

——近代山东的孔氏家族

赵兴胜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在历代尊孔政策的影响下,以孔府为代表的孔氏家族成为历经王朝更替而从未中断的文化世家,但自晚清以来,随着社会环境、政府政策的巨大转变,孔氏家族的权威受到冲击。为了维护家族的利益、文化世家的地位,孔氏族人一方面通过效忠当道、宣扬并身体力行的实践儒家思想,以获取政府的支持,同时也努力适应时代的变化,接受新文化。许多孔氏族人的教育方式、生活方式、道德意识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一批为社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

关键词: 孔氏家族; 儒家文化; 新文化; 选择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839(2001)05-0073-05

The Culture Selection in the Changing Society: the Kong Family in Modern Shandong Province

ZHAO Xing-she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Influenced by the policies of the past dynasties to respect Confucius, the Kong Family, represented by the Kong Fu, became a famous culture family that had never been broken off by the changes of dynasty. But with the change of social environment and government policies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Kong Family's status was weakened. In order to safeguard the family's interests they continued to make efforts to get the government's support by means of showing devotion to authorities propagandizing and carrying out the Confucian. At the same time, some of them, making efforts to adapt themselves to the times also received new culture, and greatly changed their ways of education, living and thinking. Then, many members of the Kong Family became distinguished figures who ha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society.

Key words: The Kong Family; Confucianism; New Culture; Selection

收稿日期: 2001-05-05

作者简介: 赵兴胜(1969—), 男, 山东泰安人,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 中国现代经济史、思想史。

受汉代以来历届王朝政府尊孔政策的影响,许多孔裔子孙毕生致力于对孔学的阐发宣扬,“始终没离开读书教书”^{[1] (第6页)},孔氏家族成为一个“多经师”^{[2] (卷六)}的、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里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化世家,家族的代表孔府也成为历经王朝更迭而“世袭罔替的贵族大地主”^{[3] (第18页)}。对此,学术界曾有不少研究。但这些研究也存在着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是偏重于经济方面,对其土地经营方式研究较多,而忽视了其文化方面尤其是近代以来的文化活动的研究,这有悖于其文化世家角色;二是缺乏比较分析,将“孔家店”视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封建思想文化堡垒,看不到其内在变化,这也有悖于常理。本文试图通过对近代以来山东曲阜孔氏家族的研究,以补上述不足。

一

自晚清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变,孔氏家族生存环境也发生很大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从政府政策的调整开始。从表面上看,近代中国的历届政府承继了封建王朝时期的尊孔政策,继续优礼孔氏族人。如晚清政府曾多次划拨“上地”补充孔府祀田,北洋政府规定孔令贻(孔令贻,1872—1919,字谷孙,孔子七十六代嫡孙,光绪三年(1877年)袭封衍圣公,曾任职翰林院侍讲、署理四氏学学务、曲阜官立四氏师范学堂总理、稽查山东学务等职)继续享受前代荣典,并加郡王衔,国民党政府先后任命孔德成(孔德成,1920年生,字达生,孔子七十七代嫡孙,1920年袭封衍圣公爵,曾任职孔氏私立明德中学名誉校长、万国道德会会长、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大代表,1949年后到台湾)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大代表,“以特任官待遇”。在孔族利益受到威胁时,总有朝野名流出面庇护。孔祥霖(孔祥霖,1852—1917,字少沾,进士,曾任职翰林院编修、会办山东学务及农工商局、兖沂曹济农垦会总办、署河南提学使、布政使、宪政编查馆一等咨议官、孔教总会总理、经学会会长。)等人筹设孔教会的活动遭到政府阻止后,在康有为的斡旋下得以转圜。^{[4] (卷上,第3页)}北洋政府的没收孔府祭田计划在张勋等人的反对下,“卒寝其事”^{[5] (第82页)}。蔡元培等人所提废孔议案由于孔祥熙等人的反对,最终未能通过。

但社会环境的变化,政治体制的变革又迫使其自觉不自觉地采取诸多“抑孔”政策。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宣布实行“新政”以挽救其统治,“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停科举以广学校”。据此,曲阜四氏学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停止文童考试,次年又废止了科举时代的重要设置——曲阜考院。^{[6] (第55—56页)}这一改革的直接结果是堵塞了孔氏族人传统的成才之路,尤为重要的是,它还使孔子学说赖以存在的政治体制及社会基础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几千年来的正统思想开始失去其在中国文化中的主导地位。民国建立,西学出身的开国巨子们以“孔子学说与民生政体相背驰”为由,力倡废孔。受其影响,北洋政府曾规定没收孔氏祀田,一律豁免孔府林、庙等户之丁银,撤销公府内旧设随朝伴官等官职,对孔教分子所提“定孔教为国教”之请求,以此举将“蹈从前以君兼师之嫌”、“开将来学术专制之渐”为由,坚决拒绝。^[7]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进步人士仍把反孔作为反封建的重要工作来做。1928年初,大学院在蔡元培主持下,以孔子思想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三民主义理论“大相悖缪”,通令全国教育机关一律废止春秋祀孔。^{[8] (第207页)}蔡元培等人还呈请取消衍圣公爵号,没收孔府全部祀田,收孔庙孔林归国有。在他们的推动下,内政部拟定了《林庙改革办法》,提出取消衍圣公袭爵等根除“封建典制”的办法。^{[9] (下册,第716页)}对各地的反孔力量也极力保护。1929年6月发生了震动全国的“《子见南子》案”(1929年6月8日,山东曲阜省立第二师范学生在校长宋还吾的支持下公演了批评旧孔教的话剧《子见南子》。事后,曲阜孔氏族人在孔族族长孔传璜等人领导下,以“侮辱祖宗”的罪名告到教育部,要求严惩宋氏,从而引发了新旧思想界之间的激烈争论。最终以宋还吾被撤职而结束争论,是为“《子见南子》案”)。案发后,蔡元培批评孔氏族人“小题大做”,要求山东省教育厅对反动势力要“下决心抵抗,决不让步”,教育部次长马叙伦要求处理该案时“不可开倒车”。迫于形势,孔德成于1928年8月呈请取消衍圣公爵封号,以符平等原则而合民国体制。^{[9] (下册,第721页)}1935年,国民政府废除了历32代、880年的封建爵号“衍圣公”。

政府政策的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动摇了对儒家思想的信仰,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带动下,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反孔思潮,甚至孔氏家族聚集地的曲阜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反

孔运动。青年学生们编印大量小册子声讨孔府，喊出“打倒孔家店”、“解放百户”的口号，并组织孔府户人上街游行示威。孔府权威受到削弱，各地大量挤占抢夺其财产。孔氏族人的各项特权陆续被剥夺，政治上的各种世袭职位大幅减少，文化教育上“无孔不开科”的旧例被彻底废除，经济上优免差徭的旧制逐渐被打破。

“历代开国必尊孔子”，但近代中国的种种表现显然与此传统大相径庭。面对此前所未有的社会变化，孔氏家族成员对儒家文化的认识也产生了分歧，有的固守传统，主张复古，有的倾向“西化”，主张变革，有的则游移于两者之间。

二

近代中国存在着一股从传统的儒家学说中寻找社会变革力量的思潮，这其中就包括许多孔氏族人。他们认为“孔教以人情为道，难须臾离，中国数千年的政化风信，以孔教为命，国体虽更，人道不异，若弃其教，是自绝其命”^{[10] (第47页)}，认为只有发扬孔子思想，才能改变“世运陵夷，邪说纷起”，“社会风俗江河日下”的局面，反对以新学为主教育孔子嫡孙，认为其“责在承继祖业”，不能“求学异邦”^{[11] (第128页)}。基于此，他们更倾向于以传统方式维护家族利益，注重实践、宣扬儒家思想。

首先，他们继承其先辈效忠政府、结交当道的传统，以编织孔氏家族的政治保护网。咸丰年间，孔府为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曾捐库平银 3000 两。光绪二十年(1894 年)，慈禧太后六十寿辰，孔令贻特地进京祝寿并报效银 2000 两。1917 年张勋策动清室复辟，它也积极支持，再三电贺“日月重光”，请求“入觐天颜”。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孔令贻也赴京祝贺，“并亲赉孔氏世谱、阙里圣庙碑碣拓文、前代冠服各物”。不久，他又出任筹安会“名誉理事”，以教育界、孔氏族众代表的名义，劝袁复辟帝制，“早日登基”^{[9] (上册，第44页)}。孔德成就任“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后，即到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演讲，盛赞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对当权政要，孔氏家族也利用各种方式联络沟通。孔令贻与主张尊孔、反对新学的张勋结为异姓兄弟，并在曲阜发起为其建立生祠的活动，以报其庇荫之功。土匪出身的张宗昌督鲁期间，以封建帝王礼仪尊孔、祭孔，孔德成乃以“世伯”待之。对于身居要职的孔祥熙更是优礼有加，孔府聘其为孔德成的政治导师，在新编家谱中也以罕见的长文记述其事迹。

其次，积极宣扬孔子学说。作为孔子后裔，孔氏家族长期托庇于孔子学说，无论从情感上还是从利益上考虑，他们大多不愿看到有损孔学地位的现象。但在急剧变化的近代中国社会中，孔子学说却日渐式微。因此，在维护孔学地位问题上，孔氏家族的成员显得尤为急迫，积极参与组织领导宣扬孔子思想的文化团体。1913 年 4 月，康有为等人在北京成立孔教总会。^[12]在孔令贻支持下，该会在 1914 年迁到曲阜，于每年的孔子诞辰日在曲阜召开全体会员大会。孔令贻还响应康有为的提议发出“请定孔教为国教”的通电，并经常率孔教会成员举行祭孔典礼。孔祥霖、孔繁朴^(孔繁朴，字厚庵，进士，曾任驻日本长崎正理事官、直隶州知州、陕西乾州、绥德等知州、孔教总会会长)都曾担任孔教总会的负责人，年幼的孔德成也曾出任由孔教会改组的万国道德会会长。^{[13] (第219页)}此外，孔祥霖等人于 1915 年 12 月成立了曲阜经学会，致力于传授理解及教读经书的方法，阐发孔子之微言大义。1925 年，孔府在族人的建议下成立“阙里孔氏私立明德中学校”，它以“尊崇孔教，阐扬东方文化，造成中坚人才，挽救世风”为宗旨^{[9] (上册，第96页)}，主要讲授古代经典与乐舞。1935 年，孔府又成立“古乐传习所”，招生传授八佾古乐。日军侵占曲阜期间，设立了儒学讲习班，不少孔氏族人任职其中。^{[9] (第177—178页)}在此过程中，他们宣扬立国之本在道德，孔学是亘古常新的真理。

第三，恪守族训，遵行礼法。在儒家看来，“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礼莫大于尊祖敬宗，典莫大于修谱”。因此，立行辈以别长幼，修宗谱以昭宗法、正名份，重祭祀以“慎终追远”，成为孔氏家族表率齐民、使儒家伦理规章化、生活化的主要措施。进入近代以后，他们继续以此为倡行孔子学说的重要手段。

1919年孔令贻在孔氏原有行辈基础上又续字二十个：“建道敦安定，懋修肇懿长，裕文焕景瑞，永锡续世昌”，并报北洋政府内务部批准，通告各地族人遵行。1928—1937年间，在孔繁朴等人的倡议下，孔氏家族在“绪翼教，导民正轨”的名义下，重修家谱。新谱除将范围扩展到孔氏六十户以外的所有支派外，严格按旧照制操作，如规定凡不用行辈命名者、异姓养子、僧道下贱等“俱不准入谱”^[14]（第16、36—38页）。对祭祀也十分重视。尽管经济上已今不如昔，但仍遵照“必丰必洁”的族训^[9]（上册，第85页），每年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祭祀孔子及各代先祖、各种神灵。例如，1921年孔府安葬孔令贻，葬礼极尽奢华，共耗银洋11714.119元，铜钱19651620文；^[9]（下册，第636—638页）1928年孔府仅用于林庙祭祀的支出就达16000元，大约是其全年收入的35.8%。^[9]（下册，第711页）^[10]（第40页）对传统的偏执甚至使其中某些人走向极端迷信和反科学。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勘建津浦铁路，计划从孔林西墙附近经过，但孔府认为铁路将“破坏圣脉”，坚决反对，最终迫使其改道。孔氏家族的这些行为，给世人留下一种封建、保守、落后的印象，并被视为社会进化的障碍而排斥，这是有道理的。

三

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孔氏家族的许多成员也在对中西文化进行着比较分析，进行着新的选择。孔祥霖早在青年时期即“留心于经世之学”，讲求时政，对“泰西之政法文艺皆有领会”。^[2]（卷五）光绪二十九年（1902年）四月，他奉命护送中国留学生赴日本，借机实地考察了日本学务及实业，使他产生了“国力强弱系乎教育之轻重，教育之轻重系乎风气之通塞”以及“实业为国家之命脉所关”的想法。^[6]（第207—208页）回国后即力主革新，致力于新学的发展，力图通过新知识的传授，使后人能“融会中西”，“不拘于一是”。^[2]（卷六）孔祥桐（孔祥桐，1874—1922，字润生，山东优级师范学堂毕业，后留学日本，历任临邑、齐河小学校长，济宁、兖州中学堂监督，山东省立中等工业学校教员、曲阜师范学校校长、第二师范学校校长等职）也认为经世致用是孔子学说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其致圣当时的根本原因，而科举之学却“舍质言文，禄利导前”，致使诸学皆废，国不能国。他提出，欲救国必先改革旧教育，注重实用科学的教育：“农工百艺皆有学，所学皆可效用于世”。他在随孔祥霖赴日考察回国后，即尽焚其旧存文稿，“一意研求新学”，以“输入物质文明以补吾国学术之缺”。^[2]（卷八）孔德成也认为：“局守固封，不足以明体达用，欲明治平之道，宜擅中外之长。”^[11]（第127页）

在此基础上，孔氏家族的教育方式发生了变化。四书五经与私塾、书院等传统的教育内容与形式被冷落，许多人更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受到新式教育，毕业于大学”^[11]（第74页），并将子女送到省外甚至是国外接受新教育。截至1934年，曲阜孔氏族人中有11人留学国外，49人毕业于高等学堂、专门学校或大学，91人毕业于各类中等学校，分别占同时期当地同类人数的78.6%、65.3%和42.3%，很多家庭几乎完全接受了近代高等教育，如孔祥桐的7个儿子“咸毕业专门学校”；^[2]（卷六、八）第六十七代衍圣公之后孔繁淦的8个子女中，除两子早夭外，所余均接受了近代高等教育，其中四子祥勉（孔祥勉，字士勋，北京工业大学电学系毕业，曾任北洋政府交通部技正，国民党昆明中央银行经理兼中央信托局经理，青岛中国实业银行经理，青岛银行公会理事长，解放后任青岛公私合营银行副经理）的8个子女中7个毕业于名牌大学；^[11]（第45—46、74页）第七十二代衍圣公之后孔祥楨的3个儿子中，两个毕业于山东优级师范学堂，一个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化学硕士。甚至肩负传承世统与道统重任的衍圣公孔德成所受教育，也在时代影响下开始学习数学和英语，并聘请了专门教读现代科学的先生。^[11]（第62页）以尊崇孔教为名成立的明德中学，1931年后也取消了经学课，增加英语、自然等课。^[6]（第83页）

家族成员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近代科技文化的产品也逐步渗透到家族生活的方方面面。西式礼仪与各种物美价廉的工业品成为时髦东西而受到欢迎。1936年孔德成的婚礼即是一种新旧礼俗的结合，婚礼中既有八抬大轿、长袍马褂、三跪九叩等祖传的规矩，也有小汽车、西式婚纱、唱赞歌等新潮仪式。其夫人的陪嫁品中，既有传统的字画珠宝古玩，也有西式化妆品、服装等上百件日用“洋货”。^[9]（下册，第634页）孔府的对外交通通讯也由传统的马队，逐步演变为近代化的工

具: 1911年,津浦铁路济(南)兖(州)段竣工,距曲阜县城18里的姚村设立了火车站;1931年,孔府架设了专线电话;1936年,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赠送孔德成1辆意大利制造的小汽车。这就打破了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形成的旧生活习惯,如“无例不可添”、“有例不可减”^[1](第321页)等,使其更密切地溶入近代社会生活中。

思想道德意识发生变化。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自由、民主、科学的新价值标准开始取代传统的政治信仰与道德原则。孔府的小姐们不再缠足,“出现了第一代‘天足’的妇女”^[10](第91页)。孔府开始尝试用科学知识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如1912年孔令贻等人与当地士绅捐资设立了施种牛痘的机关,济世活人,“颇有成效”。^[2](卷五)他们还试图以民主、法制的原则改革孔府府务的管理。1947年孔德成等人决定:取消收租中的“斗尖”、“地皮”等陋规以减轻佃户负担,取消各佃户庄的集市税收,销毁私设的大板、黑红棍等刑具。孔府管理实行委员会制,各委员轮流主席。^[1](第76、77、80页)

同时,一部分孔氏族人先后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学说。早在清末民初,孔祥柯(孔祥柯,1888—1920,字则君,北京译学馆毕业,曾任山东高等学校教务长、校长,山东省议会议员、副议长、财政部参事上行走、山东政法学校校长、山东人民赴巴黎和会请愿代表、经济调查局参议)即辞职回籍,“从事鼎革之计”^[2](卷五)。国民革命运动兴起后,又有孔祥寿(孔祥寿,号鹤生,上海文化学院政经系毕业,曾任国民党曲阜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常委等职)等人参加革命,成为国民党在曲阜的早期领导人。^[2](卷四)随着时间推移,还有更多的族人如孔宪廩(孔宪廩,1913—1941,又名张旭,曲阜师范学校毕业,曾任中共曲泗宁中心县委委员兼统战部长、组织部长,泰、新、蒙、费、泗五县边区县委书记,临、郯、费、峰四县边联县委书记,后以“托派分子”罪名被错杀)等加入到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中。据统计,至1990年,在中共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中,曲阜孔氏族人共牺牲117人^[15](第758—763页),其中70%以上牺牲于解放前。也就是说,至1949年,至少已有80余名孔氏家族成员部分或完全地信仰了共产主义理论。

总之,在近代中国剧烈的社会变迁中,具有千年传统文化背景的孔氏家族,背负着更沉重的社会、心理负担。但正是其文化世家所特有的重知识的传统,家族中的大部分人对新文化的认同、求知,较同时代的大多数人更具前瞻性,培养出孔昭曾(孔昭曾,1874—1940,字又荃,举人,曾任内阁中书侍读、曲阜四氏师范学堂监督、广饶县知县、招远县知事、山东临时省议会议员、省公署财政科科长、《续修曲阜县志》代总纂、孔学总会会长等职)、孔宪廩、孔繁壬(孔繁壬,1909—1940,字肃冰,北平艺术学院音乐系毕业,曾任曲阜第三小学、曲阜师范学校音乐教师,因参加抗日活动,于1940年5月被日军逮捕,同年7月被害)、孔祥霖、孔祥桐、孔祥柯、孔祥榕(孔祥榕,1890—1941,字仰恭,北京译学馆毕业,曾任财政部全国所得税总办、永定河河务局局长及国民政府特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孔祥勉等一大批能适应时代需要、为社会进步做出一定贡献的人才。从某种程度上说,孔氏家族在从传统向近代的转换过程中是成功的。

参考文献:

- [1] 孔繁银. 衍圣公府见闻[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2.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2] 李经野. 续修曲阜县志[M]. 民国二十三年. [10] 孔德懋. 孔府内宅轶事[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 [3] 何龄修. 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11] 孔令朋. 今生今世[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8.
- [4] 康有为. 康南海书牘[M]. 上海: 上海图书馆, 民国四年四月. [12] 孔社章程[Z]. 南京: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北洋政府档案 1001—1662.
- [5] 申君. 清末民初云烟录[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13] 康南海自编年谱[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 [6] 曲阜教育志编写组.《曲阜教育志》[M]. 1987. [14] 孔德成. 孔子世家谱(一)[M].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0.
- [7] 孔社本部呈文(1913年4月25日)[Z]. 南京: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北洋政府档案 1001—1662. [15] 山东省曲阜市史志编纂委员会. 曲阜市志[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3.
- [8] 高平叔. 蔡元培全集[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9]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孔府档案选编

(责任编辑: 王 萍)